

国外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彭远春

(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基于心理性因素与内外因素相结合的视角对国外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加以梳理,发现大多数研究认为环境行为是在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下做出的契合自身实际的选择,其对改善环境状况与提升环境质量有着积极正向作用,并将环境态度/环境关心视为关键变量,以揭示实施环境行为复杂的内在过程与心理机制;大多数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某一时点的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等高级统计方法着重探究自我报告的一般意义或某类具体环境行为。其相对忽视了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变迁、制度政策变化、阶层分化、地区差异、信息分割等外在结构性因素对环境心理的可能塑造及其对环境行为的动态影响,进而提出在准确厘定环境行为内涵的基础上,针对社会群体成员或社区居民采用问卷调查、实验法、实地观察、深度访谈等多元研究方式长期追踪收集纵向数据或资料,以及将心理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结合起来探讨不同类别的环境行为,有助于突破既有研究的心理学局限与行为决定论桎梏,且切实反映环境行为的历时性变化与动态性影响。

关键词 环境行为;环境态度;心理性因素;结构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 C9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8-0140-06 doi: 10.3969/j.issn.1002-2104.2013.08.020

20世纪60、70年代,环境心理学、环境教育学、环境社会学等学科开始介入环境行为研究,但最初往往遵循环境态度决定环境行为以及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行为有着线性关系的预设。同时,有些研究借鉴心理学将态度区分为认知、情感、意向三种成分的认识,着重对环境认知、环境情感以及环境行为意向等环境态度的组成部分进行测量与探讨,并将其用于预测环境行为^[1-2]。然而,经验研究结果并未支持这一预设,相反,环境知识对环境态度的影响较小,环境知识与环境态度对环境行为的作用较弱;在不同的研究中,态度变量最多只能解释环境行为10%—20%的方差^[3]。并且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环境知识的增多或积极正向环境态度的增强并不直接转换成环境行为。由此,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不一致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着重探讨调节二者关系的其他因素,如规范、价值观、外在情境因素等。故本研究从心理性因素以及内外因素结合这二个方面对国外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加以梳理。需要指出的是,环境行为研究是一个多学科研究领域,相关研究错综复杂,本研究这一理想类型的划分只是

试图更好的把握和理解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可避免的是,二者并非截然区分,有着内在交织性。

1 侧重心理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模式

1.1 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行为的产生与改变有着复杂的心理过程。态度并不直接影响行为本身,而是通过行为意向施加影响,同时行为意向还受行为主观规范以及感知到的行为控制的影响。而个体对预期行为会导致某种结果的信念以及其对这一结果的评价决定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则由个体感知到的参照者对是否应采取某行为的信念以及个体遵从该参照者的期望的动机所决定。故关于行为结果的信念以及参照者认可的规范信念对行为起着最终决定作用^[4]。诸多学者直接利用计划行为理论对环境行为进行了研究,如凯撒(Kaiser)等^[5]对895名瑞士居民的调查表明,单独对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加以考察时,其对环境行为有着显著作用;但将其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综合考察时,感知到的行为

收稿日期:2013-05-07

作者简介:彭远春,博士后,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公众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编号:12CSH033);中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公众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编号:2012QNZT196);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的公众环境行为研究”(编号:11YBB386)。

控制对环境行为的作用无足轻重,三者能共同解释环境行为意向 81% 的方差,而环境行为意向则决定环境行为 51% - 52% 的方差变化。

可见,计划行为理论在环境行为领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不过需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其预设个体是理性的、自主的,其行为是在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下做出的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为,实际上个体并非完全自主、理性的个体,往往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同时对日常生活中大量习惯性行为与模糊性实践关注不足。二是遵循态度与行为的经典路径,侧重关注主观规范、自我效能感、控制信念等对行为意向以及行为的相应影响,相对忽视知识、行为策略等认知类因素对其的调节作用。三是预设行为的实施依赖于行为意向的激活,忽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等因素对行为的直接影响。

1.2 环境素养模式

环境素养含义与环境意识的含义极为接近,西方学者常用于如何辨认有环境素养的公民。亨格福德(Hungerford)等^[6]为预测负责任的环境行为,特提出环境素养模式,其包含彼此间有着相互作用的八个变量,其中认知性质的变量包括环境问题的知识、生态学概念、环境行为策略三项;态度性质变量包括态度、价值观、信念、环境敏感度四项;个性变量仅包括控制观一项。希亚(Sia)等^[7]则进一步使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探讨环境素养模式中相应变量对负责任环境行为的贡献力。结果显示,环境敏感度、环境行为策略知识与技能、个体控制观、群体控制观、对待污染与技术的态度、心理性别角色等变量影响环境行为,其中环境敏感度、环境行为策略知识与技能对环境行为最具影响力。

马西尼科斯基^[8](Marcinkowski)在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应对环境素养模式加以修订。最大的变动在于将原有的“环境行为策略”更改为“公民行动”,而公民行动受制于“行动动机”和“行动筹备”这两个因素,其中“个人责任感”与“口头承诺”决定行动动机,而“行动筹备”则有赖于“行动策略的知识”与“应用行动策略的技能”;其次扩充了对“态度”与“控制观”的理解,前者包括对自然与环境、环境问题、环境污染与科学技术的态度,而控制观包括个体与团体控制观两种类型;此外,除开与自然环境接触的直接经验能激发环境敏感性之外,替代的与间接的经验以及重要他人如父母、老师等人的行为示范与影响亦对环境敏感性有着增强作用。

1.3 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模式

海因斯(Hines)等^[9]在借鉴计划行为理论以及参照环境素养模式的基础上,对 128 篇环境行为研究文献进行了元分析,并提出一个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模式。研究发现,

环境议题知识、行为策略知识、行为技能、态度、控制观、个人责任感以及行为意向与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有关。但以上识别的因素并不能有效解释负责任的环境行为,因为知识与态度、态度与行为意向、行为意向与实际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较弱。故除开行为技能、行为策略知识、环境议题知识以及个性因素之外,还存在影响环境行为的情境因素,如经济条件、社会压力、从事环境行为的机会等。加之个性因素和情境因素富于变化,二者的交互作用更是增加了环境行为的不确定性。基于海因斯等人以及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帕尔默^[10]认为有三种主要的变量类型影响环境行为,且或多或少地呈线性影响方式,其中有“门槛变量”,包括培养对环境的敏感性;有“自主变量”,包括对环境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以及对环境和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有“权限变量”,包括具有采取环境行动策略所需的知识与技能、控制点位(加强的期望)和行动的意愿。

可见,环境素养模式与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模式都将环境知识、环境行为策略与技能等认知类变量,以及环境态度、环境敏感度、行动意向等态度类变量作为研究的着力点,其已成为环境教育领域广为应用的理论,较多运用于指导环境教育实践。但这两种模式都预设“负责的环境行为是一种习得的行为,是几个变量相互作用后的偶然事件”,故其有着严重的行为主义论与决定论倾向,强调环境行为是可被推测出的,可加以塑造与修正^[10]。也就是说,其过于夸大了环境教育对环境行为的塑造作用,对知识、技能、敏感度等习得与培育性变量之外的因素关注不够。

1.4 价值—信念—规范理论

规范激活理论认为社会规范只有具体化为个人规范,方能影响个体亲社会行为。而个人规范能否激活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个体对行动结果的意识(awarenes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action; AC)以及对这些行动结果的自身责任认定(assum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se consequences; AR)。当 AC 与 AR 较高时,个人规范将被激活,进而对亲社会行为的实施产生影响^[11]。规范激活理论常直接应用于回收利用、能源节约、庭院垃圾填埋等具体环境行为研究,但解释力有限^[12-13]。由此,斯特恩^[14](Stern)在规范激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了价值理论和新环境范式,以环境行为为例提出了价值—信念—规范理论(value-belief-norm theory, VBN 理论,如图 1)。VBN 理论从相对稳定的一般价值观发端,经过人类与环境关系的信念(NEP),再到个体对行为负面结果以及有关降低行为结果威胁的能力之信念,最后激活个人规范,产生采取环境行为的责任感,其中利己价值观对环境行为起着负向作用。

VBN 理论将价值观纳入分析模型,探讨价值观的类型及其对作用,拓宽了环境行为研究,且其理论在诸多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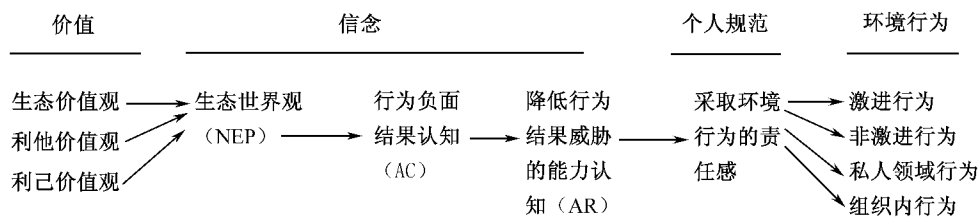


图1 价值—信念—规范理论
Fig.1 VBN theory of environmentalism

究中得到验证^[15-17]。但需注意的是, VBN理论预设环境责任感影响环境行为, 着重验证价值观—信念—个人规范这一因果链, 对环境责任感如何影响环境行为探讨不足, 同时易给人以单线决定论错觉, 忽略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多重路径。此外, 环境行为可划分为不同类型, 不同类型的环境行为是否有着不同的影响因素, 或者同一因素对不同类型环境行为的影响程度是否亦有差异。

1.5 多因素整合模式

另有诸多学者尝试在同一研究中将计划行为理论、环境素养模式、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模式以及 VBN理论加以比较或结合使用。较具代表性的是, 班贝克(Bamberg)等^[18]在复制海因斯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模式的基础上, 对1987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元分析, 然后结合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 提炼出包括问题意识、社会规范、内在归因、内疚感、感知到的行为控制、态度、道德规范、意向等八个因素在内的整合模式, 详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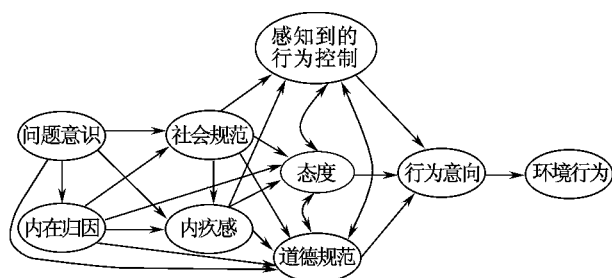


图2 多因素整合模式
Fig.2 Multi-factor integration mode

整个模式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能解释环境行为 27% 的方差, 行为意向在其他因素对环境行为的影响中起着中介作用; 除开态度和感知到的行为控制之外, 道德规范是行为意向的第三大影响因素; 环境问题意识是行为意向重要但间接的影响因素^[18]。该模式尝试将环境行为的不同理论模式加以整合, 为新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该模式支持环境行为是自我利益和亲社会动机的混合体, 故在理解和分析环境行为时将动机、自我利益以及道德规范与情感等

考虑在内, 需要注意的是, 道德规范而非社会规范直接影响环境行为意向, 社会规范只是给行为者提供行为是否合适以及行为容易程度等信息, 对环境行为是否实施起着更为间接的作用。

2 内外因素结合的综合研究

长期以来, 心理学取向的研究在环境行为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而心理学者普遍认为, 持续影响环境行为的是环境态度、环境情感以及环境行为意向等内在心理性变量, 外在条件不起作用, 或者只是通过认知、情感、信念、态度等内在变量, 对环境行为起着间接、短暂的作用, 所以对环境行为外在条件的研究常被忽略。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将与环境态度进行区分, 着重从心理层面探讨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相对, 逐渐关注外在因素对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之间关系的作用以及对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

2.1 外在因素的逐渐纳入

瓜纳诺德(Guagnano)等^[19]在研究废品回收行为时提出预测环境行为的 A-B-C 模型。该模型将内在心理过程与外在条件加以整合, 认为环境行为(Behavior)是个体一般与具体的环境态度(Attitude)和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与经济动力等外在条件(External Conditions)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 当存在有利的外在条件和积极的环境态度时, 环境行为将会发生; 当外在条件不利, 且个体持消极的环境态度时, 环境行为将不会发生; 而当外在条件比较中立时, 环境态度对环境行为的作用较强。A-B-C 模型提出环境行为是环境态度与外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并指出环境态度对环境行为的作用取决于外在条件的具体情形, 是对心理学取向研究的一个拓展, 开启了环境行为研究的新方向。

迪茨(Dietz)等^[20]认为, 对环境主义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侧重探讨社会人口特征与环境主义的关系; 二是着重探讨价值观、信念、世界观以及其他社会心理变量与环境主义的关系。而将社会结构变量与社会心理变量结合起来探讨环境主义尚不多见, 但这类研究能更好

的展示社会情境如何塑造环境态度以及揭示社会结构变量影响环境行为的内在机制。作者基于 1993 年的 GSS 数据发现,环境行为区分为亲环境消费行为、环境政治行为等不同类别,不同类型的环境行为有着不同的社会心理与社会结构影响因素。相比社会结构因素,社会心理因素更能解释各类环境行为,而且社会结构因素通过社会心理因素对环境行为的间接作用较小。不过其所指的社会结构变量很大程度上是指年龄、教育程度、性别、宗教信仰、种族等社会人口特征。

布莱克^[21] (Blake) 认为,绝大多数环境行为模式具有局限的原因在于,其对个体、社会以及制度约束缺乏考虑,且往往假定人是理性的,能系统获取和利用各种信息。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其认为环境关心与亲环境行为之间存在个性、责任与可行性三个方面的阻碍。个性因素包括懒惰、缺乏兴趣等,与态度以及性情密切相关,在个体内心层面起着阻碍作用,在环境关心较弱的个体上体现的尤为明显;责任因素近似于心理学概念“控制观”,具体包括效能缺乏、信任缺失、需求不足、无产权等方面;可行性则视为与态度或意向无关的,但阻碍亲环境行为实施的社会与制度性约束,如时间、金钱、信息、激励、基础设施等。可见,布莱克试图将内因与外因加以结合以解释环境关心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较大差距,但遗憾的是,其最终关注的仍是个性、控制观、责任感等心理性变量,对潜隐在这些因素背后的制度因素、文化因素等考虑不足。

2.2 更为综合的研究

布兰德^[3] (Brand) 认为,日常生活领域的环境行为与不同的情境有关,最为一般的是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如工业化程度、富裕水平、社会分化与整合的形式等,进而对行动者的生活以及体验现实的方式产生影响。其次,环境问题有着建构的一面,大众传媒在环境问题的建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即公共环境讨论塑造着与环境问题认知以及环境行为有关的规范性标准。再次,日常生活情境对重现公共环境讨论与环境行为规范有着选择性作用。此外,环境精神(Environmental mentality) 对日常生活的环境友好行为有着约束或者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一个旨在理解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多元、选择性情境化模型,详见图 3(此图基于布兰德文章图形及其相关内容改绘,图中* 指的是德国人环境精神的五种类型)。

此模型的优势在于,其并未质疑经济理性选择以及社会心理学解释模型对理解环境行为的重要性。不可否认,感知到的行为结果、责任与控制归属以及效率期望等影响个体环境意向;同时,“公共品困境”等诱使部分人成为搭便车者。但问题在于其无法回答,这些方面在不同日常生活情境中如何联结在一起并起着不同作用,“环境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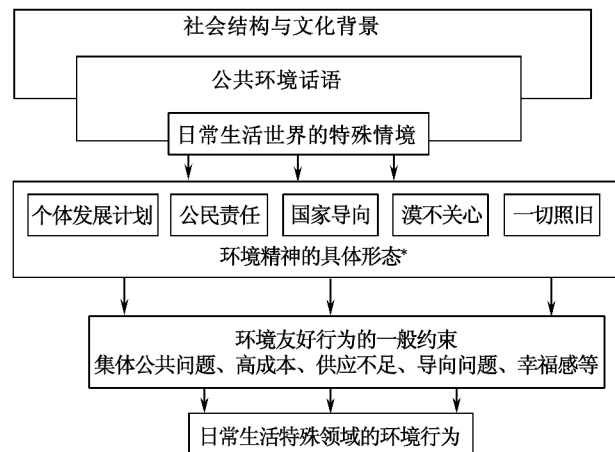


图3 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情境分析模型
Fig. 3 Context model for analysing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and behavior

概念的提出破解了这一困境^[3]。可见,布兰德基于日常生活实践,试图采取综合视角,对社会心理学情境理论、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对环境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加以整合,提炼出涵括心理性、情境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在内的一般分析框架。但缺陷在于过于综合与抽象,同时对各因素间的内在关联亦缺乏关注与理论解释,而环境精神能否统合感知到的行为结果、控制观、责任感以及成本—收益衡量等因素亦存在问题,故在经验研究中需结合实际加以借鉴。其最大的贡献在于指出环境心理学、环境教育学等学科仅从心理性因素、预期行为发生的可能情境对环境行为的相应影响加以探讨,而忽视了外在于行动者主体的结构性因素的约制,并试图基于日常生活实践,以弥补心理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之间的分割。

3 结 语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国外相关研究相当丰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首先,环境心理学、环境教育学对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其预设个体是理性的、自主的,其行为是在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下做出的契合自身实际的选择,其对改善环境状况与提升环境质量有着积极正向的作用。着重探讨环境知识、环境问题意识、环境行为策略与技能等认知类因素以及价值观、环境态度/关心、信念、敏感度、规范、责任归属、个性等心理性因素对环境行为意向与环境行为的影响;总体而言遵循“环境认知—环境态度—环境行为意向—环境行为”以及“价值观—环境关心—环境责任感—环境行为”这两条研究主线,需要注

意的是,这揭示的只是一大致的内在脉络,并非所有借鉴某一理论的研究都完全遵循此主线,具体研究结合实际情形各有侧重,而且前一类变量并非只直接影响下一类变量,其亦会直接影响更后面的变量;在大多数研究模式中,环境态度/环境关心常视为关键变量,旨在揭示实施环境行为的复杂的内在过程与心理机制。

其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诸多学者逐渐意识到个体在诸多情形下并非完全自主,进而关注外在因素对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之间关系的作用以及对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但对外在因素的探讨更多的还是基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种族、收入等社会人口特征以及时间、金钱、资源获取、实施机会等外在激励与刺激。实际上,大多数研究只是尝试将外在因素纳入既有的心理性模型,未能超越“刺激—反应”这一经典的行为主义模式框架和“成本—收益”的理性衡量架构,亦忽视了实际行为背后的制度性、文化性因素等,这些结构性力量往往以无形甚至不为主体察觉的方式制约着环境行为。而部分研究仅将外在因素视为环境行为实施情境的一部分,侧重探讨情境因素对环境心理与环境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忽略了外在结构性因素对环境心理的可能塑造。故探讨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变迁、制度政策变化、阶层分化、地区差异、信息分割等更为宏大的结构性因素对环境心理因素与环境行为的影响,有助于突破现有研究的心理学局限和行为决定论桎梏。

再次,由于实际的环境行为需要借助观察法、实验法等方式进行测量,难以实施,故现有研究大都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着重探讨自我报告的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实际上,自我报告行为是被访者对已实施行为的回顾,可能迎合社会期望效应而与实际行为有一定距离,但总体而言能反映实际行为本身。由此,自我报告行为以及实际行为之间有着内在的共通性和交织性,诸多研究对其并未加以截然区分,将其等同使用,对此我们在理解和研究环境行为时尤应注意。同时,诸多研究已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等高级统计方法,呈现出理论先验、能较好对抽象概念进行测定与评估、更好把握变量间内在关联等特点,故在有关理论模式的基础上适切借鉴相应方法有助于弥补国内研究较缺理论性、多限于描述性层次的不足。当然,若能将问卷调查、实验法等定量方法与实地观察、深度访谈等定性方法有效结合起来,则能更好地理解与把握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此外,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探讨一般意义环境行为或废品回收、垃圾分类、节约能源、消费环境行为、减少使用汽车等日常生活具体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而一般意义层面环境行为的复杂性与较难测量以及具体行为的特殊性,使得现有研究难以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与解释。由于环境

行为成因异常复杂,试图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因素在内的模式既不可行,也无助益,故在准确界定环境行为的基础上,基于日常生活实践,结合社会行动等相关理论视角,将心理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结合起来探讨不同类别的环境行为,即重点考察不同类型的环境行为是否有着不同的影响因素,或者同一因素对不同类型环境行为的影响程度是否亦有差异。同时,既有研究多基于某一时点的数据或资料对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静态探究,难以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制度设置、政策安排、生态系统等方面变动以及行动者自身社会地位变化对环境行为的动态影响,故对某些社会群体成员或社区居民进行长期追踪,收集纵向数据或资料,以切实反映环境行为的历时性变化与动态性影响。

(编辑:田红)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Maloney M P, Ward M P. Ecology: Let's Hear from the People: An Objective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Ecological Attitudes and Knowledge[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3, 28(7): 583-586.
- [2]Maloney M P, Ward M P, Braucht G N. A Revised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Ecological Attitude and Knowledge[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5, 30(7): 787-790.
- [3]Brand K W.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and Behaviour: The Greening of Lifestyles[M]//Redclift M, Woodgate G.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London: Edward Elgar, 1997: 204-215.
- [4]Ajzen I, Fishbein M. Understanding Attitudes and Predicting Social Behavior[M]. Engle wood-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0.
- [5]Kaiser F G, Gutscher H. The Proposition of a General Vers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Predicting Ecological Behavior[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33(3): 586-603.
- [6]Hungerford H R, Peyton R B, Tomera A N, et al. Investigating and Evaluat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Actions Skill Development Modules[M]. Illinois: Stipes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 [7]Sia A P, Hungerford H R, Tomera A N, et al. Selected Predictors of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 Analysis[J].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986, 17(2): 31-40.
- [8]Marcinkowski T J. An Analysis of Correlates and Predictor of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D]. South Illinois University at Carbondale, 1988.
- [9]Hines J M, Hungerford H R, Tomera A N. 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research on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 meta-analysis[J].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987, 18(2): 1-8.
- [10]帕尔默. 21世纪的环境教育——理论、实践、进展与前景[M]. 田青, 刘丰, 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2: 132-133. [Palmer J A.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Theory, Practice, Progress and Promise[M]. Tian Qing, Liu Feng, Translation. Beijing: China Light Industry Press, 2002: 132-

133.]
- [11] Schwartz S H. Normative Influences on Altruism [M]//Berkowitz.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 [12] Black J S , Stern P C , Elworth J T. Personal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Household Energy Adaptations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85 70(1) : 3 – 21.
- [13] Stern P C , Oskamp S. Managing Scarce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M]//Stokols D , Altman I.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New York: Wiley ,1987.
- [14] Stern P C. Toward a Coherent Theory of Environmentally Significant Behavior [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0 56(3) : 407 – 424.
- [15] Nordlund A M , Garvill J. Effects of Values , Problem Awareness , and Personal Norm on Willingness to Reduce Personal Car Use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3 23(4) : 339 – 347.
- [16] Steg L , Dreijerink L , Abrahamse W.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cceptability of Energy Policies: A Test of VBN Theory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5 25(4) : 415 – 425.
- [17] Scherbaum C A , Popovich P M , Finlinson S. Exploring Individual Level Factors Related to Employee Energy Conservation Behaviors at Work [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 2008 ,38 (3) : 818 – 835.
- [18] Bamberg S , Moser G. Twenty Years after Hines , Hungerford , and Tomera: A New Meta-analysis of Psycho-social Determinants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 2007 27(1) : 14 – 25.
- [19] Guagnano G A , Stern P C , Dietz T. Influences on 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ships: A Natural Experiment with Curbside Recycling [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995 27(5) : 699 – 718.
- [20] Dietz T , Stern P C , Guagnano G A. Social Structural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Base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 1998 30(4) : 450 – 471.
- [21] Blake J. Overcoming the ‘Value-Action Gap’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Tensions between National Policy and Local Experience [J]. Local Environment , 1999 4(3) : 257 – 278.

A Review of Foreign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fluencing Factors Research

PENG Yuan-chu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 Changsha Hunan 410083 ,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tudy on factors of foreign environmental behavior research , which based on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n we found that most studies believe that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s a choice of self-discipline and self-control to fit their own reality , which can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and enhance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order to reveal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the internal process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 most studies treat environmental attitude or environmental concern as a key variable. And most research use questionnaire to collect data of a certain , utiliz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other advanced statistical methods to explore self-reported environmental behavior. These studies ignored external structural factors , such a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 class differentiation , regional differences , information segmentation , which may shape the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nd dynamic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research , we should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 use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 experimental method , field observation and depth interviews to collect longitudinal data , and combine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with structural factors to explore different types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environmental attitud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tructural factors